

【书中风云】

抗战胜利之后

小时家里有一堆20世纪初的出版物，不但有民国初年的，还有清末光绪年间印行的。早期铅印只有句读没有新式标点，新闻纸已泛黄的；线装楷书石印密密麻麻的；通俗文言的，半文半白的，小说、时论，都是宣传维新的……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总要冒出多种多样的声音。

日本占领的后期，为了加紧控制舆论，也由于战时纸张严重匮乏，北京各家报纸合并成一种对开四版的《华北新报》，所有各种期刊合并成一种用骑马钉装订不套色的《中华周报》。

1945年“八一五”后，最迟到9月间，在北平（这时北京又敏感地复称北平了），可以买到平津两地的许多日报，街上叫卖的报贩都喊出花儿来。我记得听说天津出了一种以鲁迅标名的报纸，但没看到过，好像昙花一现就消失了。

这些如雨后春笋的报刊，背景不明，但总归打破了万民缄默的郁闷，基调是欢呼抗战的胜利。重庆当局还派来“先遣人员”，头号先遣官落地不久，就传出跟一位年轻风流的京剧坤角名伶的绯闻（那时候叫桃色新闻），我们是从小报的社会新闻版证实的。

接着，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各路接收大员的后续队伍络绎来到。正是唐诗人张籍所云：“战后几人归故土，惟有官家重做主！”他们在没收敌伪公产和私产（汉奸的私产叫做逆产）过程中饱私囊，大捞特捞，人们概括为“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车子、女子、位子），他们的接收也就被称为“劫收”。在这前后，还钻出一批所谓“地下工作者”，有的并没从事过抗日的地下工作，只是通过一定关系同重庆方面挂上了钩，得到授权，或者压根儿就是冒充，一样的扬长过市，招摇撞骗。

我当时写了一个小品剧

本，题名《流线型》，意即流行人物，题词“伊人天外飞来，此君地下钻出”，就是指的现象。借用（也许谈不上借用，只是在一个低层次上笨拙地模仿）“故事新编”的手法，写阿Q冒牌的把戏在咸亨酒店被人戳穿。这是1945年秋，我刚刚进了汇文中学读初一，见教学主楼安德堂前壁报连片，我一个人办起一份《五十年代》，请高中语文老师李戏鱼题写了隶书刊名；壁报由四张16开纸拼成，毛笔抄写，这个小品剧本占了一版。其他三版的文字也是我独家经营，因为没保存下来，内容已经忘记，总之不是文艺形式，多半是时评、杂感一类。

这份壁报只出了创刊号。因为给《奔流》壁报投稿，那编者是高中的马宗汉，他约我帮他编文艺版；第二年，即1946年开春我又参加了陈秉智、赵嗣良、张乃圣、李新民等组织的自由读书会，有壁报《自由周刊》，我自己就不再出壁报了。

汇文中学，壁报和壁报后面的课外社团十分活跃，在北平的中学里是突出的。后来甚至被称为中学里的“民主堡垒”。

汇文和慕贞，育英和贝满，崇实和崇慈，都是一个男中一个女中相邻，原都是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私立学校，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伪将它们改归市立，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又恢复原名。

这些学校本来就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汇文初创于1871年，当时称汇文学校，是燕京大学的前身。现在一些历史专题片里，少不了从有限的老电影胶片中翻出的一个镜头：五四运动时一支学生游行队伍打着汇文的横标。段祺瑞屠杀学生的“三一八”惨案里，汇文有唐耀昆、谢勘两同学遇难（唐耀昆是六十年后一度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唐达成的叔父），校园里一直矗立着纪念他们的方尖碑，日本占领时期，校方在碑上涂抹了一层灰泥盖住碑文，才保存了下来。

太平洋战争以前的老校长高凤山又回来了，他是留美学生，教育思想开明，汇文有比较浓厚的民主空气，跟他的学养作风分不开。我当时完全不懂政治，尤其于政治的组织层面更是不甚了了。我如饥似渴地要读课外书，读原先不曾见的新书，参加自由读书会，却不知创办者之一的陈秉智那时已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且还是支部书记。我只把他们看作同样热爱文学、同样关心国事的高年级大同学。他们告诫我要警惕校内的国民党三青团和特务学生，我才多少感觉到事情——或叫斗争的复杂和严重。

战争和灾难的动荡年代使人早熟，锻炼人应付社会生活和独立活动的的能力；变化多端的政局和你死我活的斗争则使人政治上早熟，使人增长善观察、知进退、团结多数以打击敌对力量的政治

智慧。我那些地下党的兄长们属于这一代，当时他们不过十七八岁顶多二十挂零，领导汇文等校的北平地下党中学学委李莹（化名老丁）也不过二十多岁。有人说我也算是早熟，不对，我在政治上是幼稚的，情绪化的，只是凭借朴素的正义感，作直觉的判断，跟着我信任的人走，在许多问题上几乎没有逻辑的过程。

在国民党抑或共产党、蒋介石抑或毛泽东之间作出选择，对每一个20世纪中期的中国人是多么严肃郑重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而我，这个十二三岁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在1945年秋冬在同学中间毫不避讳对毛泽东的好感：“毛泽东的咏雪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蒋介石写得出来吗？”

所有的政治力量都不免要组织青少年的游行，以壮声势。抗战胜利后，我头一次参加游行队伍，到天安门前欢迎美军，我很乐意参加，跟卡车上笑容满面、红光满面的大个子美国兵互相晓起大拇指喊：“顶好！”又一次叫我们列队上天安门前，在西边三座门那儿迎一辆检阅车，何应钦——就是1935年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签订者、现任军政部长沉着脸站在车上，像泥塑木雕，让人失望。最后一次，又驱赶我们到太和殿前空场上，说“欢迎蒋主席莅临”，场面大，我在后面“矮子观场”，扰扰攘攘，不但什么都没看清，也没看见蒋介石的尊容，就一身尘土疲乏地回家了。

而我那时已经见过毛泽东的肖像，从解放区张家口出版的《北方文化》封面上，从油印的《论联合政府》封面上，都看到单线平涂的铅笔素描毛泽东头像，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和蔼，略带愁容。那是蒋介石的咄咄逼人不可同日而语的。

（摘自邵燕祥自传《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阅案所得】

撒切尔夫人的童年生活

玛格丽特·罗伯茨的童年生活印刻着六个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严格自律，成就了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职业生涯，而另五个则各有优缺点。

五个特点中，优点包括性格坚毅、说话直率、信仰坚定。另两个缺点则因为玛格丽特的刻意掩饰而不那么明显。这两个缺点是，缺乏安全感和对自己观点相左的人（尤其是她的母亲）难以苟同。

如果以上种种特点看上去有些奇怪或狭隘，没有涉及童年生活本应有的一些特点，比如愉快、欢笑、轻松、家庭生活和父母的疼爱，也是因为玛格丽特的成长过程本就是极其不自然和严苛的。童年时她的生活拮据，父母古板。

1925年10月13日，玛格丽特出生于林肯郡格兰瑟姆市北帕拉德路一号她父亲街角小店楼上的房间里。从外观看，这座三层小楼还算不错，但其实里面居住环境拥挤，仅有最基本的生活设施。

小店差不多就是家里的全部财产。起居室在二楼，只能从柜台后面的楼梯爬上去，穿过主卧才能到达。玛格丽特和姐姐穆里尔（出生于1921年4月21日）在顶楼各有一个小房间。家里没有自来水和集中供暖设备。但最尴尬的是没有独立洗澡间，全家人都得在铁制的澡盆里洗澡。这个所谓的底楼洗澡间位于小店后院，同时也兼做室外厕所。家里没有花园和室内厕所。

即使以20世纪20年代的标准来看，玛格丽特的成长环境也算是清苦节俭的，但节俭并非因为贫穷。玛格丽特的父亲阿尔弗雷德·罗伯茨在格兰瑟姆拥有两间杂货店，完全有能力为家里安装当时房地产代理商所说的“现代化便捷设施”。但他是个坚持原则的人，认为家庭生活应当勤俭节约。他信奉省钱而不是花钱，并对自己的女儿说，从第一次工作在商店当伙计起，他就一直信奉这条原则。那时，他一周赚14先令，其中12先令用于食宿。至于余下的钱，“省下多少钱，才有多少钱可以花”。玛格丽特的父亲以经济为重，严格管理财政，所以才不愿意花钱在家里安装自来水。

玛格丽特却十分关注这些生活设施。担任首相六年后，在一次采访中，她语出惊人，告诉米里亚姆·斯多帕德：“当时家里很小，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生活设施。我还记得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住在一个漂亮的房子里，嗯，房子里的设施要我自己家多得多。”

“你总是肩担责任。”玛格丽特回忆往事时说的这句话既适用于小店老板，也同样适用于政客。尽管阿尔弗雷德·罗伯茨在两家杂货店雇了三个伙计帮忙，他的店很大程度上还是家族生意。他是个亲力亲为的老板，常常在柜台后面切熏肉。他的妻子和岳母负责招呼客人；两个女儿也要在店里帮手，特别是学校放假的时候。玛格丽特还记得很小的时候曾在店里帮忙称糖：把批发来的装在大袋子里的糖散称成一磅或两磅的小袋装。

担任首相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喜欢称自己的父亲为“杂货店老板专家”。这种画蛇添足式的称呼可能源自玛格丽特对父亲十分敬重而产生的浓浓自豪感，同样的自豪感也曾使另一位英国首相泰德·希思情不自禁地称自己的父亲为“建筑工大师”。

事实上，两位首相的父亲都只是普通商人。罗伯茨一家位于北帕拉德路的小店只是街角一家普通的杂货店，售卖各种糖果、巧克力、面包、宠物食品、水果和蔬菜。这家店也兼做小邮局，本地居民经常过去买邮票、取养老金或者兑现邮政汇票。尽管阿尔弗雷德·罗伯茨因为店里进货的质量好于附近的英国合作社商店而颇有些名气，但他这种杂货店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小镇很常见；店里顾客的经济窘困在这种杂货店也是极其寻常的。可是经营这家杂货店并塑造玛格丽特修养的这家人的性格却绝不常见。

（摘自《撒切尔夫人：权力与魅力》，[英]乔纳森·艾特肯著 姜毓星 罗小丽译）



全家福(前排中为梁漱溟)

【灯下碎语】

先父给予我的帮助

我从小学起一直到现在，回想一下，似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主动的；无论思想学问做事行为，都像不是承受于人的，都是自己在那里瞎撞。几乎想不出一个积极的最大的能给我帮助的人来。我想到对我帮助最大的最有好处的，恐怕还是先父。

先父给我的帮助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我在《思亲记》上曾说到这意思。我很奇怪，在几十年前那样的礼教空气中，为父亲的对儿子能毫不干涉。除了先父之外，我没有看见旁人的父亲对他的儿子能这样信任或放任。恐怕我对于我自己的儿子，也将做不到。先父对我的不干涉，最显著的有几点：

我在中学将要毕业的时候，一面考毕业试验，一面革起命来。本来在未毕业时，已与革命党人相通，毕业后便跟着跑革命。到第二年民国成立，照普通说，这时应当去升学，不应当去干没有名堂的把戏。——我们那时的革命，虽也弄什么手枪炸弹，但等于小孩子的玩意，很不应如此。而我不想去升学，先父完全不督促，不勉强我。先父的人生思想是向上的，有他的要求主张，可是他能容纳

我的意思而不干涉。何以能如此？我现在还完全想不到。后来我由政治革命，由社会主义转到佛家，自己终天东买一本佛书，西买一本佛书，暗中自去摸索，——这也是主动的瞎撞，一直瞎撞若干年。——先父也不干涉。先父有他的思想，他自以为是儒家的，可是照我的分析，先父的思想与墨家相近，可说表面是儒家而里面是墨家的精神，对于佛学很不喜欢。我既转向佛家，我就要出家，茹素，不娶妻，先父只将他的意思使我知道，而完全不干涉我。这就成就我太大。那时我虽明白先父不愿的意思，但我始终固执，世界上恐怕找不出像我这样固执的人